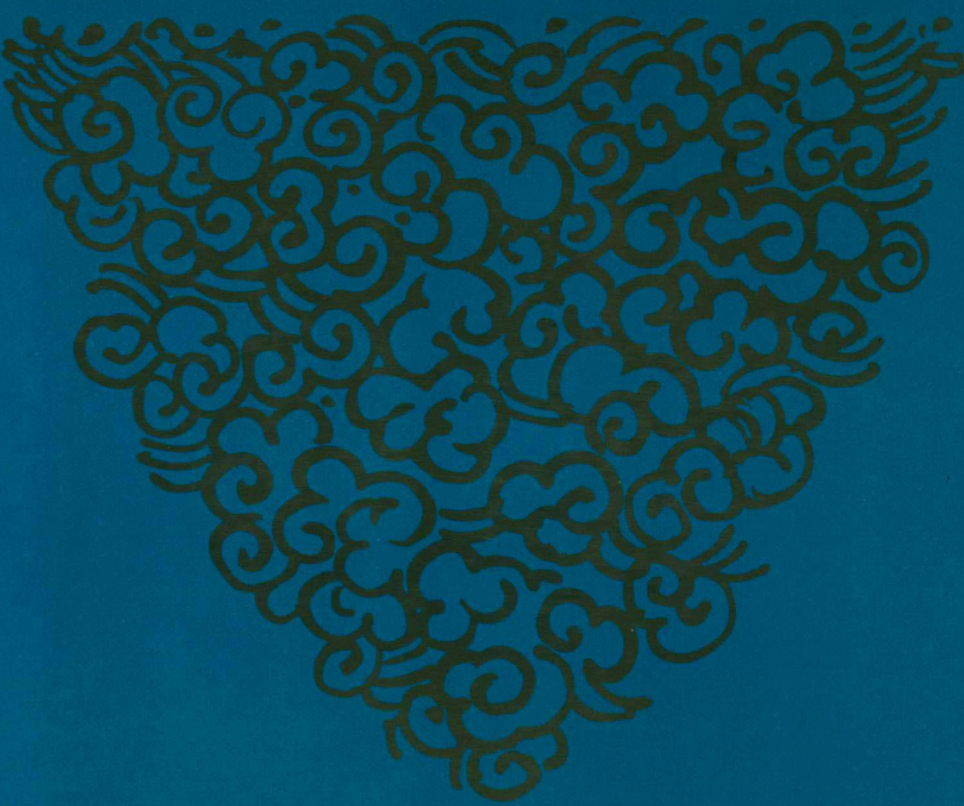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新譯 孔子家語

行印局書民三 / 書叢譯新注今籍古 / 譯注 春秋羊
類 學 哲 / 閱校 五鳳周



民 三

ISBN 957-14-2352-1 (030)



00360



9 789571 423524

羊春秋注譯
周鳳五校閱

新 譯

孔
子
家
語

三民書局印行

新譯孔子家語／羊春秋注譯．--初版．

--臺北市：三民，民85

面； 公分．--(古籍今註新
譯叢書)

ISBN 957-14-2351-3 (精裝)

ISBN 957-14-2352-1 (平裝)

1. 孔子家語-註釋

121.2

85005890

網際網路位址 <http://Sanmin.com.tw>

◎ 新譯 孔子家語

注譯者

羊春秋

校閱者

周鳳五

發行人

劉振強

著作人
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產權人

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
發行者
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

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
郵撥

／〇〇〇九九八—五號

印刷所
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門市部

復北店／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
重南店

／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

初版

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七月

編號

S 03116

基本定價

柒元貳角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・不准侵害

ISBN 957-14-2352-1 (平裝)

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

劉振強

人類歷史發展，每至偏執一端，往而不返的關頭，總有一股新興的反本運動繼起，要求回顧過往的源頭，從中汲取新生的創造力量。孔子所謂的述而不作，溫故知新，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所強調的再生精神，都體現了創造源頭這股日新不竭的力量。古典之所以重要，古籍之所以不可不讀，正在這層尋本與啟示的意義上。處於現代世界而倡言讀古書，並不是迷信傳統，更不是故步自封；而是當我們愈懂得聆聽來自根源的聲音，我們就愈懂得如何向歷史追問，也就愈能夠清醒正對當世的苦厄。要擴大大量，冥契古今心靈，會通宇宙精神，不能不由學會讀古書這一層根本的工夫做起。

基於這樣的想法，本局自草創以來，即懷著注譯傳統重要典籍的理想，由第一部的四書做起，希望藉由文字障礙的掃除，幫助有心的讀者，打開禁錮於古老話語中的豐沛寶藏。我們工作的原則是「兼取諸家，直注明解」。一方面熔鑄眾說，擇善而從；

一方面也力求明白可喻，達到學術普及化的要求。叢書自陸續出刊以來，頗受各界的喜愛，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，也有信心繼續推廣這項工作。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，我們注譯的成員，也由臺灣各大學的教授，擴及大陸各有專長的學者。陣容的充實，使我們有更多的資源，整理更多樣化的古籍。兼採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的要典，重拾對通才器識的重視，將是我們進一步工作的目標。

古籍的注譯，固然是一件繁難的工作，但其實也只是整個工作的開端而已，最後的完成與意義的賦予，全賴讀者的閱讀與自得自證。我們期望這項工作能有助於為世界文化的未來匯流，注入一股源頭活水；也希望各界博雅君子不吝指正，讓我們的步伐能夠更堅穩地走下去。

導讀

(一)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《孔子家語》二十七卷，顏師古注：「非今所有《家語》。」蓋《漢志》所著錄的《家語》，至唐已亡。今本《家語》十卷，共四十四篇，為三國魏王肅所傳，王氏在《孔子家語·序》中，託言「孔子二十二代孫有孔猛者，家有其先人之書。昔相從學，頃還家，方取已來，與予所論，有若重規疊矩」，欲以說明他所傳的《家語》，確係孔氏之家藏祕本，而非他所偽撰；並以書中所記，作為攻擊鄭玄的根據，與其所作的《聖證論》相表裏，以提高自己的聲價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王朗傳》附《王肅傳》云：「初，肅善賈（逵）馬（融）之學，而不好鄭（玄）氏。」因「集《聖證論》以譏短玄」，被鄭玄的學生孫叔然「駁而釋之」，由是後人認為今所傳之《家語》，實乃王肅所偽作，用以攻擊鄭氏之學的。本來綴集六經百家之語，用來羽翼孔書，宏揚儒學，歷代多有，如梁武帝的《孔子正言》二十卷，王勃的《次論語》十卷（今皆不

傳》，楊簡的《先聖大訓》十卷、薛據的《孔子集語》二卷、曹廷棟的《孔子逸語》十卷、孫星衍的《孔子集語》十七卷，都屬於這一類。然此皆博搜群籍，纂輯成書，往往一一注明出處，故或有援稽失實之譏，而絕無託名偽造之嫌。獨王肅所傳的《家語》，假託家藏，疑竇滋多。如今本《家語》四十四篇，其中有故事及言論二百六十餘則。錄自群經的，有《左傳》、《禮記》、《詩大序》、《尚書大序》；錄自先秦諸子的，有《莊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等。錄自漢人著述的，有《淮南子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《大戴記》、《史記》、《說苑》、《新序》以至東漢王充的《論衡》等。移錄的形式：一是一字不易，照錄原文，這是絕大多數；二是改成孔子與其弟子及時人相與問答的故事或言論；三是顛倒原著的次序，綴輯其中的要言妙語。這兩項是少數。以王肅的博學多識，在他所作的簡注中，避而不談那些故事與言論的來源，以神其書為孔氏的家藏祕本，並非綴輯古籍而成的。僅就訓詁、名物、義理與鄭玄相齟齬的加以注釋，藉以攻擊鄭氏之失。茲就其移錄《禮記》中的〈儒行〉和〈禮運〉兩篇鄭、王兩家的分歧加以對比，便可以見其眉目了：

(1) 訓詁上的分歧

① 阻之以兵而不懾（〈儒行〉）：

王肅注：阻，難也，以兵為之難。

鄭玄注：沮，謂恐怖之也。

②不隕穫於貧賤，不充詘於富貴（《儒行》）：

王肅注：隕穫，憂悶不安之貌；充詘，踴躍參擾之貌。

鄭玄注：隕穫，困迫失志之貌；充詘，失節之貌。

(2) 名物上的分歧

①衣逢掖之衣（《儒行》）：

王肅注：深衣之袂大也。

鄭玄注：逢，猶大也，大掖之衣。大袂，禪衣也，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。又說：禪衣，袂二尺二寸，袪二寸。深衣，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。

②環堵之室（《儒行》）：

王肅注：方丈曰堵，一堵，言其極小也。

鄭玄注：環堵，面一堵也，五版為堵，五堵為雉。

(3) 義理上的分歧

① 杞之郊也禹（〈禮運〉）：

王肅注：杞，夏后本郊繇，周公以繇非令德，故令杞郊禹。

鄭玄注：先祖法令，子孫所當守。

② 大夫死宗廟調之變（〈禮運〉）：

王肅注：大夫有去就之義，未必當死宗廟者。其死宗廟者，權變為也。

鄭玄注：變，當為辨，聲之誤也，君守社稷，臣衛君宗廟者。

我們且不去論鄭氏與王氏的是非，即此數例，亦可以見王肅偽撰《家語》之用心，在於以它作為攻擊鄭氏的工具，則是非常明顯的了。而吳郡黃魯曾不察，在其所作之《孔子家語·後序》中說：「是以孔氏獨多述作，自《魯論》、《齊論》言之，又有《家語》，疑多鯉、伋所記，並門人先後雜附之者，要之，咸孔子之意也。」肯定王肅所傳的《家語》，乃孔鯉、孔伋所記，並孔氏門人先後之所雜附，顯然是失於稽考的。我已把全書四十四篇，其中含小言論、小故事二百六十餘則，除個別的小言論外，一一注明其出處於每章章旨之中，使讀者知其所自來，雖「咸孔子之意」，但絕不是孔鯉、孔伋「所記」，更非孔氏的門人「先後雜附之者」，而是群經、諸子及漢

人著述中的「百衲衣」、「綴白裘」，這應該是本書所作的貢獻。

(二)

《孔子家語》綴輯了群經之言、百家之語，不管王肅偽撰之目的如何，客觀上起到了羽翼孔書、宏揚儒學的作用。它通過了具體的言論和故事，從為政以德、修身以禮、待人以恕、辨物以審諸方面，歌頌了孔子的至德、至聖、至仁、至博的品德和修養。

孔子對於為政之道，不但有系統的理论，而且有豐富的實踐經驗。他說：「雖有國之良馬，不以其道服乘之，不可以道里；雖有博地眾民，不以其道治之，不可以致霸王。」而治國之道，在於「內修七教，外行三至」。所謂「七教」，就是「上敬老則下益孝，上尊齒則下益悌，上樂施則下益寬，上親賢則下擇友，上好德則下不隱，上惡貪則下恥爭，上廉讓則下恥節」。所謂「三至」，就是「至禮不讓而天下治，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，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」。他還認為「仁者莫大乎愛人，智者莫大乎知賢，賢政者莫大乎官能」（以上並引自《王言解》）。說明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，在於「愛人」、「知賢」和「官能」。所以他告訴魯哀公說：「政之急者，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。」「省力役，薄賦斂，則民富矣；敦禮教，遠罪疾，則民壽矣。」這就是「愛人」的具體體現。又告訴子路說，賢君治國所先者，「在於尊賢而賤不肖」，但如果「尊賢而不能用，賤不肖而不能去」，那就不免於滅亡（以上均引自《賢君》）。這就是「知賢」的主要內涵。又說：

「為政在於得人。」「得人」就是要「爵其能，重其祿，同其好惡」，使之能盡心竭智以為國（以上引自〈哀公問政〉）。這就是「官能」的基本要領。孔子的政治思想，雖然是一以貫之的，但他卻能「各因其事」，具體對待，齊君為政，「奢乎臺榭，淫于苑囿，五官伎樂，不解於時」，孔子則告以「政在節財」；魯國的「三桓」，「內比周以愚其君，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」，孔子則告之以「政在諭臣」；楚國的政治危機在於「民有離心，莫安其居」，孔子則告之以「政在悅近而來遠」（以上均引自〈辯政〉）。雖然所告不同，但仍然沒有離開他的「愛人」、「知賢」和「官能」的基本政治原則，這也是孔子不易企及的地方。

孔子不但有一套系統的政治理論，而且在政治實踐上，得到了很好的驗證。他在為中都宰時，便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化政策，如「長幼異食，強弱異任，男女別塗，路無拾遺，器不雕偽」，使當地的風俗有了很大的改變，「鬻牛馬者不儲價，賣羊豚者不加飾，男女行者別其塗，道不拾遺，男尚忠信，女尚貞順」，「行之一年，而西方之諸侯則焉」。這是「敦禮教，遠罪疾」的「愛人」政治。及其為魯司寇以至攝行相事，既墮了超過規定的三都，以「強公室，弱私家」；又誅了「心逆而險」、「行僻而堅」、「言偽而辯」、「記醜而博」的「姦雄」少正卯，以防其聚徒成黨，談說飾非；還挫敗了「鼓譟劫定公」的陰謀，指出「裔不謀夏，夷不亂華，俘不干盟，兵不偪好」的盟約原則，但卻赦免了父子相訟的當事人，認為「慢令謹誅，賊也；徵斂無時，暴也；不試責成，虐也」（以上引用的是〈相魯〉和〈始誅〉）。仍然是圍繞「為政以德」的政治原則來施政的。

孔子不但自己在政治實踐上是堅持自己的政治原則，而且在評價他的學生及時人的政績時，也是用這把尺來衡量的。子路治蒲，孔子入其境，不斷地對他的政績加以贊揚，子貢懷疑他「未見由之政，而三稱其善」，是偏了心眼，孔子解釋說：「吾見其政矣，入其境，田疇盡易，草萊甚辟，溝洫深治，此其恭敬以信，故其民盡力也；入其邑，牆屋完固，樹木甚茂，此其忠信以寬，故其民不偷也。至其庭，庭甚清閒，諸下用命，此其言明察以斷，故其政不擾也。」（《辯政》）这就是用「為政以德」的尺來衡量子路的政績的。因為子路以自己的忠信、寬厚和明察，使其民能盡力，能不苟且，能樂其生、安其居。孔子北遊於農山，要求子路、子貢、顏淵各言其志，顏淵最後表示要「敷其五教，導之以禮樂，使民城郭不修，溝池不越，鑄劍戟以為農器，放牛馬於原藪，室家無離曠之思，千歲無戰鬥之患，則由（子路）無所施其勇，而賜（子貢）無所用其辯矣」。孔子嚴肅地贊揚他說：「美哉德也。」（《致思》）還是用「為政以德」這把尺來衡量他們的志趣的。子張問入官，孔子告以「臨之無抗民之惡，勝之無犯民之言，量之無侵民之辭，養之無擾於其時，愛之無寬於刑法。若此，則身安、譽至而民得也」。又說：「故君子蒞民，不臨以高，不導以遠，不貴民之所不為，不強民之所不能。」（以上均引自《入官》）一切從「愛人」出發，一切以仁厚為本，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愛戴，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，所以孔子一再闡釋它、強調它。所謂「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眾星拱之」（《論語·為政》）。「古之為政，愛人為大。所以治，愛人」（《禮記·哀公問》）。正因為孔子在魯，推行了以「愛人」為中心的「德政」，取得了巨大的成績，因而「齊人患其將霸，欲敗其政，乃選好女子八十人，衣以文飾，而舞容璣，

及文馬四十駟，以遺魯君」。季桓子接受了齊國所送的女樂，「君臣荒淫三日，不聽國政」，孔子知其不可與有為，才憤而離開魯國（《子路初見》）。這是孔子的不幸，也是魯國的不幸。

修身以禮，是孔子所恪守的。《儒行解》中所列舉的自立、容貌、備豫、近人情、特立、剛毅、憂思、寬裕、舉賢援能、特立獨行、規為、尊讓等十多種品德，是孔子對一般儒士的要求，自然也是孔子所身體力行的。孔子是聖人，他說：「所謂聖人者，德合於天地，變通無方。窮萬事之終始，協庶品之自然。敷其大道，而遂成情性，明並日月，化行若神，下民不知其德，覩者不識其鄰。」（《五儀解》）即無論道德修養、學問器識，都達到了最高的境界，這是孔子衡量聖人的標準，也是孔子所嚴格要求自己的。所以他常說，君子有三患，有五恥，有三恕，有三思。所謂「三患」，即患弗得聞，患弗得學，患弗得行。聞道、學道、行道，是君子所追求的三種境界。所謂「五恥」，就是恥有其德而無言，恥有其言而無行，恥既得而復失，恥地有餘而民不足，恥眾寡均而人功倍己（《好生》）。恥這恥那，就是要把知和行、學和用有機地結合起來。所謂「三恕」，就是「有君不能事，有臣而求其使，非恕也；有親不能孝，有子而求其報，非恕也；有兄不能敬，有弟而求其順，非恕也」。這就是韓愈所批評的「不以眾人待其身，而以聖人望於人」，顯然是和忠恕之道背道而馳的。所謂「三思」，就是「少而不學」、「老而不教」、「有而不施」（《三恕》）。不學，就沒有知識；不教，就沒有培育人才；不施，就不能在窮困時得到別人的援助，所以要很好地反思。因此，他總是用「恭敬忠信」來教育自己的學生。他說：「恭則遠於患，敬則人愛之，忠則和於眾，信則人任之。」（《賢君》）有了這四個方面的修養，就能遠患、和眾，

得到人們的愛戴和信任，因而有終身之樂。他說：「君子之修行也，其未得之，則樂其意；既得之，又樂其治。是以有終身之樂，無一日之憂。」（《在厄》）所以他厄於陳、蔡之間，絕糧七日，而絃歌不絕，甚至把它看作一種鍛鍊，一種幸福。他說：「夫陳、蔡之間，丘之幸也，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。吾聞之：君不困，不成王；烈士不困，行不彰，庸知其非激憤勵志之始，於是乎在。」在匡人的包圍中，也泰然處之，彈琴而歌，他說：「不觀高崖，何以知顛墜之患；不臨深泉，何以知沒溺之患；不觀巨海，何以知風波之患？」（以上均見《困誓》）真是貧不改樂，窮不改節，正像他所說的那樣：「芝蘭生於深林，不以無人而不芳；君子修道立德，不謂窮困而改節，為之者人也，生死者命也。」（《在厄》）這是孔子敦品勵行的梗概。

值得進一步強調指出的，孔子經常把學習和修身聯繫起來，把學習和虛心也聯繫在一起。他認為非學無以進德，不虛心則不容易收到溫故知新之效。他經常教育他的兒子伯魚說：「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，其唯學焉？其容體不足觀也，其勇力不足憚也，其先祖不足稱也，其族姓不足道也。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，流聲後裔者，豈非學之效也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。」（《致思》）他把「學」放在「容體」、「勇力」、「先祖」、「族姓」之上，是「顯聞四方」、「流聲後裔」的唯一選擇，所以他嚴正地表示：「夫幼而不能強學，老而無以教，吾恥之。」（《三恕》）他自己也是以「好學不倦」、「誨人不厭」自豪的。老聃、萇弘、師襄、郊子之徒，其賢不及孔子，而孔子不恥下問，向他們問禮、問樂、學琴、問以鳥名官之故，而且「奉教唯謹」。他說：「吾聞老聃博古知今，通禮樂之原，明道德之歸，則吾師也。」（《觀周》）於是「問禮於老聃，訪樂於萇弘」，

「學琴於師襄子」（《辨樂解》），孔子知道鄭子熟悉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，「遂見鄭子而學焉」（《辨物》）。要真學到一點東西，就要虛懷若谷。所以孔子經常以「謙受益，滿招損」來警惕自己、告誡學生。他在參觀了魯桓公廟的敬器後，喟然歎曰：「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？」接著便告訴子路以「持滿」之道說：「聰明睿智，守之以愚；功被天下，守之以讓；勇力振世，守之以怯；富有四海，守之以謙。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。」（《三恕》）他在讀《易》至於《損》、《益》，也喟然而歎曰：「夫自損者，必有益之；自益者，必有決之。」接著又告訴子夏說：「凡持滿而能久者，未嘗有也。故曰：自賢者，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。」（《六本》）孔子之所以那樣博古通今、博學多聞，應該說是他虛心好學的結果。他不僅虛心學習，而且善於學習。看到東流之水，便悟出「水似乎德」。他說：「其流也則卑下倨邑，必修其理，此似義；浩浩乎無屈盡之期，此似道；流行赴百仞之嶮而不懼，此似勇；至量必平之，此似法；盛而不求概，此似正；綽約微達，此似察；發源必東，此似志；以出以入，萬物就以化絜，此似善化也。水之德有若此，是故君子見必觀焉。」（《三恕》）他看到了「君子貴玉而賤珉」，便悟出「君子比德於玉」的道理，認為玉的「溫潤而澤，仁也；縝密以栗，智也；廉而不劌，義也；垂之如墜，禮也；叩之其聲清越而長，其終則詘然樂矣；瑕不掩瑜，瑜不掩瑕，忠也；孚尹旁達，信也；氣如白虹，天也；精神見于山川，地也；珪璋特達，德也；天下莫不貴者，道也」，因而「君子貴之」（《問玉》）。他總結出水的八種品德，玉的十一種屬性，都可以對人的道德修養產生著積極的影響，所以人們「樂水」而「貴玉」，這是他在學習中善於領悟、善於聯想的一些適例。

學以致用，是孔子對學習的目的性的一個明確的要求。他認為自以為了不起的，則天下之善言必不入於耳，因此他在政治實踐中，樂於聽取別人的意見，故他在斷獄處事時，很少有失誤。《好生》中記載了他一個斷獄的故事：「孔子為魯司寇，斷獄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曰：子以為奚若？某以為何若？皆曰云云如是，然後夫子曰：當從某子，幾是。」這是何等的審慎，何等的謙虛！所以他主張「凡聽五刑之訟，必原父子之情，立君臣之義以權之；意論輕重之序，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；悉其聰明，正其忠愛以盡之；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，獄必三訊焉」（《刑政》）。他不但自己以敬慎恐懼的態度對待國家大事，而且也常常是這樣去要求他的學生的。他告訴子貢在「治民」時，要「懷懷焉若持腐索之扞馬」。子貢認為他膽太小了，他說：「夫通達御皆人也。以道導之，則吾畜也；不以道導之，則吾讎也，如之何其無畏也。」（《致思》）這是孔子把學習的目的性運用在政治實踐中的具體體現。他不但能虛心接受建設性的意見，而且能夠心平氣和地接受侮辱性的評論，《困誓》中說他到鄭國去，與弟子們走失了，孤單單地站在東郭門外，有人把他比作「鬃然如喪家之狗」，子貢把這話告訴了他，他不僅沒有生氣，而且欣欣然歎曰：「形狀末也。如喪家之狗，然乎哉！然乎哉！」說明孔子是何等的豁達大度、寬厚容人，這也是他成為「大成至聖」的原因吧！

孔子的博學多識，與他的學而不倦、溫故知新是密切相關的。他的知識，有來自書本的，有來自生活的，也有來自推理的。如季桓子穿井獲狗，而孔子知其為羶羊。因為他從書本上得知「石之怪夔蜎蝓，水之怪龍罔象，土之怪羶羊」。吳璵會稽，得到一節能夠裝滿一車的「巨骨」，誰都